

# 目 录

- 一、宜山县洛东乡壮族社会历史调查(另本) ..... (1)
- 二、田东县檀乐乡壮族社会历史调查 ..... (77)
- 三、东兰县那烈乡壮族社会历史调查..... (130)
- 附件一：广西东兰县革命委员会最低政纲草案(1929年10月)**  
    ..... (168)
- 附件二：目前宣传标语(1930年8月1日)** ..... (169)
- 附件三：土地革命问题(1930年8月2日)** ..... (173)
- 四、东兰县中和区东里屯社会历史调查..... (175)
- 附录：革命故乡东里屯**..... (198)

# 宜山县洛东乡壮族社会历史调查

**调查整理者：**韦文宣、王天奖、谈琪、唐兆民、张介文、  
颜世杰、吴琼

**稍加整理者：**唐兆民、李维信

## 壹、概 况

洛东乡于1958年撤区并乡时建立。全乡境域，包括原来的洛东、大曹、寻田三个小乡。并乡不久，于同年8月25日建立了洛东人民公社。全乡共有37个自然村，6个生产大队；大队办公室地点，分别设于大冲、坡榄、王格、大曹、塘冲和寻田等村。除大曹、塘冲、木见、大成4个村约有300户是汉族外，其余都是壮族聚族而居的村庄。据1958年8月统计，全乡共2,163户，10,039人。其中工商业20户，65人。从事农业的2,143户，9,974人，总人口中男性4,846人，女性5,128人；主要劳动力2,674人，附带劳动力1,510人。

耕地土质，以壤土、粘土为数最多，而且绝大多数都在平坝上。全乡耕地共27,842亩，其中水田16,471亩，旱田1,463亩，畚地9,908亩。平均每人占耕地2.7亩有余。

乡内壮族居民，以韦、覃两姓为最多，其余则为彭、梁、廖、兰、莫、谢、何、黄、樊、钟、罗、周、张、姚等姓。汉族有周、程、张、黄、罗、韩等姓，而大成村韩姓，原为韦姓，约三十年前才改韩姓的。而这些汉族聚居的村庄，都集中在乡境北部，即唐代的曹洛县治所在地大曹村附近。

壮族自称为“布宗”（pú zìòng），称汉族为“布滚”（pú guǎn），“滚”即“官”的对音，意即讲官话的人。称苗族为“温苗”（wēn miòu）。称瑶族为“温友”（wēn yóu）。称仡佬族为“布整”（pú k jím）。

洛东乡在宜山东南约40里，东界三岔乡，西连洛西乡，南邻平南乡，北接柳城县六塘乡。环乡四周皆山，中间是一片肥沃的小盆地，东西约二十里，南北约十五里。地面开豁。

乡境边缘，尽是石山，具有喀斯特（岩溶）地形的特点，到处奇峰兀立。乡内的山，都各有名称，其中最著名的，照当地俗传：“东有‘挂榜’（在三岔口），西有‘灯台’（在洛东圩后），南有‘大坡’（在坡榄村后），北有‘群羊’（在大曹村后）。”石壁间常有深邃的岩洞，地下也往往如此。因此，穿山过洞的溪水，以及从伏流中涌出的源泉，所在多有。当地壮族，称这种由地下涌出的流水，大者称潏（lēn），小者为泵（mèn）。泵本作“蹦”（bèng）此处借为壮族村名，洛东地区壮族读作“闷”（mèn），泉水之意。如潏村和泵村，均因此种涌泉而得名。

乡境内的大河为龙江，自西而东，沿着北境奔流，经三岔乡而入柳江县境。此水可通木船，有航运之便；但因河床过低，而少灌溉之利。可供灌溉稻田的，反而是由山洞中流出的三条溪流：一发源于宜山县南部的水头山，北流经那养村，入洛西乡境，折而东流，经王客村而至大曹村附近，汇合发源于潏村的溪水，注入龙江；一发源于平南乡的板罗村背之大

潞，东北流约三里，折而北流，经朋友村后的山隘而入乡境，复经冲翻、板亮等村，至坡榄村南，支分为二：左支流经坡榄村西，至花流村前，北流经方田、田心等村，注入龙江。右支流经坡榄村东，出喇坡村前，又分一小支，北流灌溉上摩、思九等村稻田，主流则东北奔流，经大安至山脚村，纳山脚的泉水，至洛东车站附近，流经覃田村而注入龙江；一发源于潞村之大潞，向东北流经泵村，纳泵村之泉水，再东北流经吴村，至大曹附近，汇合洛西流来之溪，注入龙江。这三条溪水，虽然宽不过一丈，深不过三尺，但全乡16,000多亩稻田，完全仰赖它来灌溉。其中由洛西流经塘冲、大曹等村的一条，源较远而流量较大，经冬仍能保持可资农田灌溉的水量。发源于潞村泵村一条，也经冬不涸，故有“龙死不旱”之谚。只有发源于板罗村的一条，到了冬天，溪水就消减大半，如果遇春旱，则坡榄、花流、喇坡、思九、大安等村附近稻田，便因缺水灌溉而不能进行春耕。此外，溪底多是石灰岩，罅隙甚多，若不勤加补塞，水从罅隙中漏去，也会影响灌溉。

乡境当桂黔的交通要冲，黔桂铁路，由西而东地横贯境内。铁路尚未建成之前，由广西柳州通往贵州独山的古道，大致也是沿着这条铁路线的。如以乡政府所在地（旧圩）为中心，东行200里至柳州，20里至三岔，10里至洛黄，地与柳江县的流山、洛满、成团（旧名二都）接界。西行约20里至洛西，再20里而达宜山县城。西北行有大路可通柳城，20里至六塘，再90里至柳城县城。这条交通线，是较早的古道。在明末以前，桂黔交通要道，是由柳州经柳城，再经六塘，而抵大曹，复西行经庆远府城而通贵州的。明神宗万历四十年（1612年），岳和声来庆远府做知府时，便是沿着这条古道走的，有他所著《后骖鸾录》可证。南行约6里，到冲翻村，越喇隘山坳即，为平南乡境，有路可通南乡圩和沃峒（现名欧峒）。这一带即为清代理苗县丞的辖境。此外，境内村屯之间，都有大小路径互相联系。解放后，于洛东圩修筑了一条公路通往黔桂路的洛东火车站附近，如果把桥梁涵洞再加修筑，即可通车。现在全乡6个生产大队，都已安装电话，彼此联络，甚为方便。

洛东圩境是乡境内唯一的圩市，有33户，人口不过百余。街道狭窄，解放前只有一两间小杂货店，每逢圩期，赶集的人最多只有500左右。但在本乡的近邻却有几个较大的圩市：西面有洛西圩，东面有三岔街，东北面有六塘圩（属柳城），南面有南乡圩，均与洛东圩相距约20—30里。

乡境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年平均温度在20°C左右，最高37°C，最低零下2°C—3°C，夏季长达6—7个月（即5月—10月）。冬季约两个月（即12月至次年2月），霜雪很少见到。年平均降雨量为1284毫米，大部份集中于5月至8月，约占年总降雨量的70%；2月—4月次之，约占年总降雨量的20%；1月及9月至12月雨量最少，仅占年总降雨量的9%。年日照时间在1,560小时以上。全年四季，作物都能生长，这时对于农业生产是十分有利的。

境内地面平坦，土地肥沃，物产资源相当丰富。粮食作物有稻谷、玉米、大麦、小麦、黄豆、荞麦及红薯、芋头等；经济作物有甘蔗、芝麻、花生、油菜、蓝靛、烟草等。矿产则有铜、铁、煤、硫磺、石英石等。

全乡现有农业中学一所，是1958年开办的，学生共56人。初级小学7所，完全小学一所，卫生院一所，卫生所6所（每个生产大队各一所），中心俱乐部一所。每个大队都有供销部和信用部。此外，宜山县第三中学校址，也在乡境之内，开办至今，已历三年。当地农民子弟上学，极为方便。

全乡每个生产大队，都已建立了党团支部。全乡共有党员78人，团员200多人。

# 贰、历史

## 一、历史概述

宜山县作为历代封建王朝的地方行政区域，已有两千年的历史。据地方志记载，远在西汉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南越王国”之后，设置的郁林郡属的定周县，即今之宜山县地。当时曾筑有土城。至唐朝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宜州刺史吴怀忠修筑宜州城，即因汉代土城而易以砖石（见1918年纂修《宜山县志》卷一）。其说虽未可尽信，但在唐代以前，这个地方已为封建王朝所管辖，似乎不应怀疑。因为，宜山县地处广西中心地区柳州的西边，两地相距不过260里。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柳州这个中心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力图把势力伸张到西偏的宜山地区，这是极其自然的事。由于这里是一个山重水复，易守难攻的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因此，自汉以后，历三国、两晋、南朝以至于隋，封建王朝在宜山地区的统治势力仍很薄弱，故在汉文史籍和方志中都没有这个地区的有关记载。

到了唐代，有关宜山地区的军事和政治的记载，已经比较详明。这个时期，唐王朝在这里的统治势力已大大加强。据汉文史籍记载，现在的宜山县境隶属宜州，是唐代的龙水、崖山、东璽、洛封（后改洛曹）等县的境域，而且还包括环绕着这些县境的三个羁縻州——即温泉州、琳州和蕃州。这三个羁縻州之下，又各领二至三个县，共八个县。唐代封建王朝的统治势力深入到这个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并分割其地设州置县，分而治之。这个事实反映唐王朝统治势力的加强，同时也反映了当地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是相当激烈的。封建王朝利用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来进行统治，实行“羁縻”政策。

到了五代时期，宜州先后属于楚马氏和南汉刘氏。当时封建王朝对这里的统治势力，较唐代又有了加强，其表现是把崖山、东璽并入龙水县，使纵横约50里的龙水县辖区扩大，权力加强了，地位也日益重要。

宋代，封建王朝把原属柳州的洛曹县也并入了龙水县（后改宜山县），归宜州管辖。原有的羁縻州，也从此次第归并。到了明朝，已经不再有温泉、琳、蕃等羁縻州的名称。明封建王朝为了实现“分而治之”和“以土治土”的反动统治政策，便把宜山县内一些少数民族反抗斗争较强的地区，分割开来，设置永定、永顺正副三个长官司。清代封建王朝则继承了明朝统治者的老办法，这些土司辖境，并没有多大改变。至雍正年间，在县境东南部划出了功德、窑灰、清潭、南乡四里。建立理苗分县，由宜山县丞管辖。

必须注意的是，宜山县城自唐初至清末，一直附在宜州州城或庆远府府城之内。也就是说，宜州或庆远府这上一级的统治机构，一直设置在宜山境内。因此，宜山县境，便成为历代封建王朝设州置府的中心地区，而宜山县城也成了历代王朝在桂西的政治、军事重镇。

从上述历史事实看来，自唐代起，宜山就已成为广西西北部的一个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以后随着封建统治的逐步加强，迁入这个地区的汉族也越来越多。由于民族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彼此在经济、文化方面得以取长补短。特别是汉族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

术的传入，对于宜山地区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

现在的洛东乡，即清代的雒东里，即唐代的洛封县或洛曹县境。宋《太平寰宇记》载：“洛曹废县，旧洛封县，在洛曹山。”清《庆远府志》载：“唐宋洛曹县，今县（按：指宜山）东四十里，雒东里大曹堡等地。”《宜山县志》载：“洛曹山在洛东里大曹渡口。山势如列屏，下瞰龙江，土人营其上为寨。宋时洛曹县在其下。后改为大曹镇，今废，遗址犹存。”现在乡境内有大曹村，村背便是龙江，江北石山绵亘，岗峦起伏，形势险要；地当黔桂路侧，为黔桂交通古道之要冲。这个村落附近的山上便是洛曹县治所在地。宋代把洛曹县并入龙水县（后改宜山县）之后，大曹一地，仍然是个军事据点和经济要区。如明代的大曹驿，清代的大曹堡都设在这里，直到清朝晚期，在大曹村附近的龙江岸边，曾经开设过盐埠，遗址至今尚存。

远在一千多年以前，洛东之所以能够成为桂西北政治中心或军事据点，这和它正当交通要冲是分不开的。就省际来说，是广西柳州通向贵州独山都匀的交通古道。古道先是从柳州，西北至柳城，再从柳城沿着龙江西进，经头塘、二塘、三塘、四塘、五塘、六塘而达大曹，途程约200里；再由大曹西进40里而至庆远府城，即宜山县城。再西经河池、南丹两县境而通贵州。这条古道，在明朝末年还是黔桂交通主要路线。后来不知在清朝的什么年代，才改由柳州西部柳江县属的成团、洛满、流山等地，入宜山县境之洛黄、三岔而达大曹；会合原古道之后，再经宜山、河池、南丹而通贵州的独山。由此可知，洛东是上述两条古道必经之地。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保持通往广西西北部的政治军事中心庆远府和保持黔桂两省的交通，对于这个交通线上的这一要点十分重视。因为，不如此，不但在当地的统治地位无法巩固，而且对广西的腹心重镇柳州，也会受到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反抗斗争的极大压力。如在唐宋两代封建统治势力已经伸入到庆远府辖境之后，被统治阶级称之为“抚水蛮”的少数民族，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不绝如缕。明代以后，聚居宜山西部和西南、西北等处的壮瑶两族人民的所谓“三巢”，为了反抗统治阶级的压迫、掠夺与剥削而经常地给封建统治者以打击。封建统治者对于这些反抗斗争，实行残酷的镇压。如果他们不能控制统治区内的交通线，就无法巩固这个统治区的政权。因此，封建统治者重视经营洛东是极其自然的。

洛东成为重要地区的另一原因，是由于它与柳城和被统治者视为“难治之区”的永顺副长官司及理苗县丞的辖境接界。洛东的东北，隔龙江即为柳城县境的六塘。六塘又与冲墨和永顺副长官司等处相接；洛东的东南，紧接理苗县丞辖境。而理苗县丞的辖境，又是在清朝雍正七年划割忻城土县的功德、窑灰二里及永定土司的清潭、南乡二里而成。这些地方都是少数民族聚居的重峦叠障的山区，封建统治者把它划作理苗分县，分而治之，其原因就是由于这些地区“最称难治”。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洛东设城堡，置戍兵，一则是为了扼守宜山县和庆远府境的东方门户，再则是为了防范附近山区少数民族的反抗。

正是由于洛东地区具有地当交通要冲，并与邻县接壤，以及接近少数民族反抗斗争比较激烈的山区的特点，所以远在一千多年前，就已成为政治和军事的要地。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他们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地位，为了镇压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派兵戍守，并迁入大批汉人。这一方面加深了统治者同当地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矛盾，激起少数民族的反抗，另一方面，戍兵和迁入的汉人，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了当地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壮、汉等各族杂居，促进了民族交往，发展了民族关系，因此洛东一带壮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都较一般的壮族地区为高。

## 二、民族来源

洛东乡境内的居民共2,163户，其中约300户是汉族外，其余都是壮族。全乡共37个自然村，除大曹、塘冲（包括蒙村）、木见、大成四村居民绝大多数是汉族外，其余各村都是壮族。汉族都集中居住在唐、宋两代的洛曹县城和明清两代的大曹镇或大曹堡的附近，四村互相毗连。从中可以看出乡境内的汉壮两族的住区，也是各有其一定范围而不是错落相处的。

聚居在洛东乡境内的壮族，以韦姓最多，分布于乡境东、南两面的泵村、涝村、同上、大冲、小冲、花流、坡榄、比七、板亮、冲翻、朋友、喇坡、大安、山脚等村，且多聚族而居。其次是覃姓，分布于乡境东北面的田心、覃田、维社、社村等村，也多是聚族而居。再次是罗姓和彭姓，前者多住在乡境西部的罗村，后者则住在南部的思九村。其余梁、廖、钟、樊、谢、何、莫、兰、黄、姚、周、张等姓，多数分布在乡境西北一带村庄，且多姓杂居。汉族计有周、罗、蒙、韦、程、王、张、李、姚等姓，除周姓多数居住大曹村，韦姓（近三十年来改为姓韩）居住大成村（原名大村），罗姓和蒙姓多数住在塘冲村外，其余各姓，也互相杂居。汉族绝大多数都住在乡境北部，而且村落还互相毗连。

洛东地区壮族的来源，可以肯定，在明代以前就有部份定居在这里，但已无从稽考。现在居住在这里的壮族居民，据老人的口述及有关文字记载，都说是明末清初从别处迁来的。韦、覃两个人口最多的大姓，原籍既相同，迁来的时间又不相上下。例如泵村、大冲、小冲、花流、同上、涝村、比七、板亮、冲翻九村的韦姓，自称是同宗共祖的子孙。据他们老人的口述及墓碑记载，他们是从宜山县街迁来的。最初迁至这里的始祖是韦德律，至今共历十六代，如果以二十五年为一代计算，约为375年，从而推知他们迁来洛东的年代，大致是在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19年）。至于迁徙的原因，据大冲村七十二岁老人韦昭兰口述，当时洛东人口很少，他们的祖先是迁来开垦的，田心、覃田等村的覃姓，也是当时一道来此的。而且来此开垦之说，曾记载在他们的宗支簿上，可惜宗支簿在抗日期间散失，以致无从查对。又据覃田村六十二岁的老人覃庆芬（洛东乡卫生院医师）口述，他们祖先来到洛东，至今已有十七代。其原籍地址，也与韦姓的传说相同。现住坡榄村的韦姓，如果按照他们宗祠内的祖先神位牌上记载的代数计算，从始迁到此的先祖韦副通算起，至今仅为十三代，如按25年为一代，中间共历十二代，约为300年前才迁到这里，时间约当清世祖顺治末年。但他们于清德宗光绪六年（1880年）所刊的宗祠碑文，却有：“如我辈始祖，自皇明乐业此庄”的记载。据此可知韦副通迁居坡榄的年代，至多也不过是明朝末年。此外，其他人口不多的壮族各姓，我们虽然没有逐一调查，但据现在泵村的莫姓和思九姓的彭姓，都说韦覃两姓先到洛东，而他们的祖先是后到的。

又据喇坡和坡榄村老人们口述，他们韦姓始祖，原姓韩，为汉代韩信的后裔。最早本来住在山东省历城府益都县糯米巷福堂街，与谭、谟二姓的祖先，结为兄弟，后因韩信被杀，三姓一同避难而迁来广西，并各去本姓的偏旁，韩改为韦，谭改为覃，谟改为莫。韦、覃两姓到广西后，其先人曾经住过思恩县，后由思恩再迁至宜山县属德胜附近的都街，最后才是移居洛东的。至于迁徙的原因，详情不知，只听长辈传说，因为思恩县的山区地方狭小，所以迁到都街，后来又迁到洛东这片又宽又平的地方来。

至于定居这里的汉族，有的讲普通话（广西普通话，俗称官话），有的讲汉语方言百姓话（又名土拐话）。其祖先来源，虽然比较复杂，但据了解，几个人口较多的大姓，他们的先祖迁居洛东的年代，大致上是在明末清初。例如，现住大曹村的周姓，据老人们口述，其先祖是从湖南衡州迁来。而他们的第三世祖周志文的墓碑上，刻有死者的出生年月为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据此往上追溯两代，加上五十年左右，则为公元1684年。据此，可知，周姓迁来洛东的先祖的出生年代，当在清康熙二十年左右。而其迁来大曹村的时间，约在康熙四十年以后。又如现住塘冲村的罗姓，据老人们口述，其先祖是从江西迁来的。原来姓汪，后改姓罗，改姓的原因他们已不复记忆。据推断，可能是入赘于当地壮族而改从妻姓的，因为现在宜山的壮族，罗姓仍复不少。至于迁居这里的年代，据他们第四世祖罗应启的墓碑记载，迄今已历十五代。如以二十五年为一代计算，从迁来的第二代祖算起，约为350年。可知塘冲罗姓的先祖定居洛东的年代，大概是在明万历年间。又如现在塘冲村的蒙姓，据宗支簿记载，先祖原籍广东韶州府，后迁居广西田州，因世乱而迁至柳州住了一代，至蒙定全时才移居洛东。迁来洛东的年代，已无文字记载和口头传说。据他们第五世祖蒙仁美的墓碑记载，死者出生于清康熙元年，即公元1662年，如果从蒙仁美再往上推溯四代，约为100年。则他们迁来这里的先祖的出生年代，约在1562年，即明嘉靖四十年前后。假定他在三十岁左右迁来洛东，其时当在明万历年间。又如现住大成村的韩姓，据清道光二十年（1840）宗祠碑上载，他们的先祖在明朝末年从山东迁来，第一世祖名叫士科，曾当过粤西思恩县千总，卸职后迁至庆远府东门街居住，再迁而定居洛东村。迁居洛东的具体年代不详，只知从一世祖算到现在，共为十三代。据此，则大成村韩姓迁至洛东的年代，和坡榄等村韦姓相同。其实，大成村韩姓，原为韦姓，约三十年前，该村地主韩向荣，才号召同他共祠堂的韦姓，都改为韩姓的。韩向荣的父亲名叫韦连宗，是当地五十岁以上的人通体咸知的事。至于韩向荣之所以要改韦为韩，也是以韦姓是韩信后裔的传说为其根据的。大成村韦姓和洛东其它各村韦姓，祖先的传说相同，迁来的年代也相同，足见他们祖先与壮族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所不同的，只是大成村韦姓早已不讲壮话，而讲汉族方言百姓话（又名土拐话）；其它村庄的韦姓，至今仍讲壮话而已。

从上述的壮汉两族的祖先来源看，可知现住洛东乡境内的居民，不论壮族或汉族，都在明末清初从别处迁来，并非当地土著。而迁来这里定居的壮汉两族，由于长期友好相处，在血缘上早已有着密切的关系。就现今住在大曹、大成、塘冲、木见、甘村的几个汉族大姓，则是周、罗、韩、蒙、程等五姓。除周、程两姓外，其中韩姓，本为韦姓，而蒙姓，则都是现在桂西北一带壮族的大姓。本乡蒙姓现在虽然操着汉语方言，自己承认是汉族，但其祖先的渊源，有极大的可能是由于婚姻关系而改从妻姓，或是由于汉壮两族杂居在同一的村庄里，最初时壮族的人数少于汉族。壮族不得不学习汉族的语言，日子久了，壮族便讲汉族的话了。假如从当地居民的姓氏和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来看，这种关系是很显著的。例如：现住大成村的韩姓，原为韦姓，现在讲的是百姓话，木见村的韦姓也讲百姓话，而附近其它各村的韦姓却讲壮话；塘冲村的罗姓讲的是百姓话，而相距不过数里的罗村罗姓都讲壮话；木见村和大曹的姚姓讲百姓话，而龙兴村的姚姓却讲壮话。这些具体事实表明，当地汉壮两族长期以来，友好相处，关系是十分融洽的。而在这种融洽相处的过程中，两者在经济上、文化上以及语言上相互影响是很自然的。

至于洛东地区的壮汉两族于明末清初迁居这里的原因，除最初定居泵村的韦姓传说是来此开垦之外，如果再从一些历史记载来推断，还有如下几种可能性：

第一，可能是当时封建统治者，为了实行“以土治土”的策略，从思恩和德胜一带，征

调士兵来这素称军事要地和地当交通要冲的洛东一带立屯防守，其后一些士兵便在这里定居下来。据《宜山县志》卷三《时政》记载，清雍正六年（1728年）庆远府知府徐嘉宾在武装镇压了莫大恩、覃海碧等的反抗斗争之后，在呈上广东巡抚的详文中曾说“窃照庆远一郡属，在万山之中，民居其三，休、佯、伶、侗、瑶、壮六种苗蛮居其七八，古之所称侗蛮，即其此也。苗族犷悍……最为难治。而宜山县属南北西三巢，龙门司与附近府城之清潭、南乡……皆强横不法，较他处为尤甚……。”据此可知，境界与洛东相连的清潭、南乡两处，便是封建统治者心目中的“最为难治”之地。他们除开把清潭、南乡两里，划归理苗分县管辖之外，再在与理苗分县紧相连接的洛东和三岔等处，设堡屯兵防守，借以保护黔桂的主要的交通路线。历史上洛东乡的大曹地方，不是设堡，便是设塘汛。而三岔地方，据《宜山县志》记载，由于“逼近龙江，上下皆滩，客轮往往被劫，后设外委（按：即千总、把总一类的武官）驻防，患始息。”现在洛东各村的壮族，几乎每个村庄都有一定的共有峒场，作为放牧、采樵及垦荒种畜之用。而各村公共峒场的来历，从上举庆远知府徐嘉宾的详文中，也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他说：“查土兵土司，原系给有兵田；再于驻割之所，拨给山地，自行垦种、帮补饭食。”这通呈省的详文，虽然说的是调拨南丹、那地、东兰三土州的士兵，驻扎德胜镇附近一带要隘的事。但以彼例此，现在洛东壮族各村的峒场来源，很可能是当时官府拨给士兵、作为“帮补饭食”的山地。

第二，据《宜山县志·灾祥》记载明朝万历二年（1574年）和四十六年（1618年），庆远境内，曾经先后发生过两次大瘟疫，接着又是饥荒，当地人口亡死，十居七八。在以往毫无预防传染病的情况下，越是交通要道所在，传染也越厉害。洛东地当黔桂交通要冲，其死亡人数，当不下于其它地区。瘟疫之后，人口大大减少。洛东这一段平坦而肥沃的地方，势必有很多荒芜的田地。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封建统治者，就可能移民来此垦荒种植，以期对劳动人民进行粮赋的剥削。据喇坡、坡榄两村韦姓老人口述：“我们的祖先，从前原住在思恩，那里尽是山峒；后来迁居到德胜都街，那里也是山峒，地方窄狭，难得谋生，最后才迁到洛东这个又宽又平的地方来的。”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当时移民垦荒的情况。如果这里人口多的话，他们迁来，就不可能获得田地和山场，那与住在都街时又有什么分别呢？他们可能是在瘟疫流行之后，这里人口稀少，田地荒芜的情况下迁来的。

第三，现在洛东乡的大曹、大成、塘冲、木见等四个汉族村庄，不但互相毗连，而且都集中在唐宋两代的洛曹县城和明清两代的大曹镇、大曹堡或大曹驿，以及清代盐埠附近。汉族之所以集中住在这个长期以来都是政治、军事、经济要点，必然也和历代封建统治者在这里的政治、军事活动有关。据推断，他们或是被封建王朝强迫征戍而来的劳动人民，或是身为统治阶级的政治官吏或军队弁目留居此地。再不然，就可能是因经商到此而定居下来。如果再追溯到较远的年代，自从唐代在洛曹山下建立洛封县或洛曹县后，其县治所在地，也必然是外来汉族集中居住的地方。后来陆续迁入这个地区的居民，不论是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因杂居的关系，也必然习用先居住这里的汉族居民的语言。当然，这些后来者却不一定是由于政治或军事的原因而迁居这里的了。

# 叁、经 济

## 一、农 业

### (一)土质与农作物

洛东一带农民，过去计算土地，是以田面产量的虚数作为单位的：即以产多少斤稻谷来定标准，从未用亩数来计算，土地改革后，才以亩为单位。据1958年8月25日统计，全乡耕地面积共27,842亩，其中水田（包括烂泥田）16,471亩，旱田1,463亩，畚地9,908亩。

全乡田地土质大体上可分七种，其中以黄土为最多，约占总面积30%；其次是老土、白土和黑土，各占总面积20%左右；再次是猪屎土和砂土，各占总面积5%左右。它们的性质是：

黄土：深二、三寸，呈黄色，黏脚，干燥时不成颗，土瘦，种禾不易发莠，宜下牛粪作苗肥，属下二等土。近山边的田，多属这类土质。但另有一种黄土却比老土较好。

老土：深四、五寸。性粘，成团如杯大，小的指头大，土冷不黏脚，不加石灰，易生藻类；撒石灰后泥湿，丝藻散开，才不致于使禾受到包围。不撒石灰，禾苗秋后才发莠，属下等土，主要分布在大安屯近山及村庄附近。

白土：深四、五寸，带白色，干燥时结成块状，湿时滑而黏脚，属中等土，性冷，宜下石灰、草木灰等肥料。分布在坡榄、喇坡、涝村村前和洛东圩前，不宜种麦。

黑土：深五、六寸，黑色，属上等土。性软黏脚，但这种土的面积数量不多。此外，另有一种黑土，不肥沃，不宜种稻，但宜种麦。

猪屎土：黑色，融软，深五、六寸，属上等土，但这种土面积数量很少，只村边田有些。

砂土：表土内夹杂些细砂，故表土寒冷，禾苗长得不好，属下等土。但种二苗较好，因在秋收前天气暖和之故。

以上是稻田的土质。

畚地的土质，平坝畚地共有三种，即：黑土，为上等土，带黑色，深度约五寸；白土，中等土，白色，四寸深；黄土，呈淡黄色，深三、四寸。山坝共有四种土质，即：黑土，属上等土，深四寸；黄土，属中等土，深三、四寸；白土，属下等土，性冷，深二寸；砂土，属下等土，性冷，深四寸许。

洛东乡境内的粮食作物，计有稻谷、玉米、麦类及高粱、黄粟、稗子、薯类等。

(1) 稻谷 这里种植水稻较多。水稻有粳稻、粘稻和糯稻三种，而每种之中，又有好几个品种。

粳稻（大米）：有大红粳、小红粳、白粳和九里香粳数种，产量相当高，百斤田面可产

65—140斤老秤（100斤老秤约等于120斤市称，下同）其中以大红粳为最好，粒大，滑而软，产量较高。谷粒不易脱落。出米成数达74%左右。

**粘稻：**有白粘、白花粘、冬粘、红粘、九工早、百日早（老头苗比九工早较迟收）和矮仔粘几种。白花粘适种冷水（泵水）田。这个品种由湖南传入，先在洛西乡祥马村栽种，迄今约有五十年了。因当时有个湖南织网工匠到洛西，见当地种本地品种收成不好，第二年他就带来了种子。试种后收成较好，于是这个品种便在洛西推广，以后洛东也引过来，并广为种植。当地农民称它为“湖南老种”。白粘谷粒多，出米成数高（磨为80%，碾为72%），性粘，软和可口，冬粘、红粘均与大禾同，红粘较硬，酿酒用。

**糯稻：**有大糯、小糯和冷水糯三种，以冷水糯为最好，谷粒易脱，米白质软。据坡榄屯六十八岁的韦瑞金老人说，他们最初种的头苗是九工早（插后90天收割），后来换为红梗粘（插后80天收）和蚂蝗粘。瘦田种红梗粘，肥田种蚂蝗粘。1945年后，才换这两个品种，其优点是：（1）可提前十天收割；（2）产量高，约增加一成；（3）米质较九工早软而好吃。这两个品种是从大曹村引进的。

二苗，先种短脚粘，因常生葱（标葱），不成穗，所以后来就改种高脚粘品种。

**（2）玉米** 有高脚玉米（七月种）、矮脚玉米和红颖爆卷玉米几种，但后者占少数。矮脚玉米又有粘、糯两种，二月种六月收，百斤的地面产40—50斤（老秤）。

**（3）麦类** 分大麦（少种）、荞麦（又名三角麦，有春荞和秋荞两种）和小麦。大、小麦亩产都在200斤左右，荞麦亩产约80斤。

**（4）其它谷类** 高粱、黄粟（小米）、穆子等谷类，多种于畚地，为数不多，主要种在一些边角地带，也不重视护理。亩产量一般在50—100斤。

**（5）薯类** 主要是红薯和木薯，多种在旱地和山畚里，耕作也比较粗放。红薯产量较其它地区为低，亩产很少达到1,000斤，一般在500—700斤之间。木薯的种植更少，其产量和红薯大致相同。

这里的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菜、黄豆、芝麻、苧麻、甘蔗等。

油菜多种于秋收后的稻田里，少数种在旱地上。亩产籽50斤左右；另有一种叫大油菜的，开白花，茎叶较高大，产量亦较高。

黄豆多种在旱地里，也有间种在玉米地里的。专地播种者，亩产较高，一般可达150—200斤；间种者产量稍减。

芝麻的种植数量很少，一般在旱地里播种少量，每户每年收二、三斤，用作一些食品的配料，如将其和糖混合春碎作馍粑馅心之类。大量种植以作油料或出卖是极少的。

甘蔗有两种，一种是青皮蔗，一种是红皮蔗。洛东乡最初只种青皮蔗，何时开始引入，现已无人知道。至于红皮蔗的引入时间，则是四年前（1955年）的事。红蔗最先在大曹屯，种植，现在许多壮村也栽种了。

苧麻是解放后才从洛西引入的，种植的数量极少。有的户人手较多，便在园边地角种一小片，每年收获三、五斤麻丝，作为搓绳制鞋之用。

此外，这里的农民，曾经有过开荒地种南瓜的一般经历。以南瓜作为蔬菜和喂猪的饲料，这是由来已久的事。他们几乎家家户户，每年或多或少都要栽种一些。但是大量地种植，却是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以后。因为那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借口抗战，不断地增加粮赋和其它捐税；地主也乘机把他们的赋税负担，转嫁在农民身上，加重田租剥削。许多贫苦农民，陷入无以为生的困境，他们或是抛荒了自己的小块土地，或是退回了向地主租种的

水田，逼不得已上山开荒度日，并借以抗缴赋税。在开荒地大量地种植南瓜，或是在南瓜地里间种一些玉米。荒地营种两年以后，第三年便可种植黄豆。他们以黄豆、南瓜换大米，当时的市价是：五担南瓜可换一担稻谷；一担黄豆可换两担大米。

洛东乡农民常种的蔬菜，品种也较其它壮族地区为多。瓜类有南瓜、冬瓜、水瓜、苦瓜、丝瓜等；叶菜类有芥菜、调羹白菜，包心芥兰、包心白菜等；此外还有豆角、葱、蒜。这些蔬菜在这里普遍栽种，已有80年左右的历史。

从农作物品种的增加与改变情况来看，可知洛东地区汉壮两族劳动人民在经济文化上的交流是十分密切的。因此，壮族各方面的发展水平，与附近汉族没有多大差别。

## (二) 生产力

### 1. 劳动力

这里的壮族人民同其他地区壮族人民一样，互相帮助是他们传统的习惯和高尚的美德。据老人说，早在60年前，这里的劳动人民就有着“换班”（即变工）的习惯，如《宜山县志》说：“宜山贫民，丧葬相助，如甲有丧，乙为之资；乙有丧，甲为之助，名曰结孝。”如遇到家庭建造新屋或是婚丧等事，同村和亲友，都自动前来帮助，主家只供饭餐，不需什么报酬。在未去帮助之前，都事先询问主人何时用人，或说明自己那天能够来帮助，一则表示关切，二则也好给主家准备和安排工作。每年春耕秋收的农忙季节，大家也互相帮助，有时还自带耕牛农具或其他用具。在还工时，不一定按照对方助工的日数及劳力的强弱去还工，双方对这些都不计较。一般的农活，大家只互相帮忙三、四天，建造房屋时相助的时间较长些。这种互助的习惯，不仅增进劳动人民之间的团结友爱，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力得以组织起来，对生产起着积极的作用。

解放前，这里两性间的分工非常明显，而且可以说是相当严格。这从提高劳动技术的意义来说，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他们的分工是这样的：男子专管犁田、耙田、翻地、耙地、烧石灰、挑粪、打谷、砍柴、割草、刈草皮灰，修制农具等；女子专管扯秧、插秧、耘田、割稻禾、护理棉花、蓝靛、纺织、缝补、料理家务、喂养家畜等，除极贫穷之家外，许多生活较好的人家，妇女多打理家务，不大做田工。解放后，这里的妇女还极少有人会使用犁耙和做砍柴割草等工作。1958年时，由于男人多被调去炼钢铁，妇女才开始学做男人过去做的活路。此外，如除草、收玉米和其他畜地作物，男女都一样干，没有什么性别之分。

青壮年是田间劳作的主要劳动者，老年人多是做些轻微劳动，妇女纺织、看管小孩、喂养禽畜、煮饭等家务劳动；男人看田水、计划安排生产、修理农具、编织草鞋、绳子等；十四、五岁的男孩，如果不上学的话，也参加一些劳动，看牛或管带弟妹；十二、三岁的女孩子也是如此。父母对儿女非常宠爱，总是让他们多玩乐，少去干活。总之，在农事劳作方面的劳动程度，男子超过妇女；而在家务方面，恰好相反，男子却不如妇女。

这里田地虽多，种植作物也不少，但由于生产工具比较先进，技术较高，而且水利条件也较好，农民除开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外，劳动力还有些剩余。因此，做小生意的人特别多，几乎每村都有半数以上的人家从事担头生意活动，来往于附近几个墟镇，如三岔、宜山、南乡、洛西之间。这种小贩活动，男女都有参加。

## 2. 生产工具

据泵村两位82岁的老人韦创尤、韦尔金说，这里何时开始使用犁耙，已无人知道，只知他们的祖父已用犁耙来耕田种地，三岔的社村吴姓铸犁头已有四代的历史。百余年前，湖南铸犁工匠也已到三岔墟开炉铸制犁头。又据柳城县六塘乡韦怀恩（58岁）说，他曾经听到祖父说过，他的曾祖（距今约160年）时已有犁耙等工具，但犁架笨重，约20斤，犁铧是湖南人铸制的。犁身较低，犁铧较尖，易破土。六塘与洛东只一河之隔。由此可知，最迟在150年前，这里的犁耕农业已相当发达了。

这一带农民所使用的农具，种类繁多，根据农活不同分别专用，可见是相当进步的。现分述如下：

**犁** 据大冲村70岁的老农韦善荣说，他少年时曾听老人说过，本地在几百年前，种田尚用踏犁，但以后即全用牛拉犁。牛拉犁有二种，即“标犁”和“坐犁”。前者犁架较长，而且在犁面背有二耳，夹在犁架后部的直木外；后者只有一耳，插入犁木内。两种犁的犁嘴犁面长宽度相同，标犁易于掌握，但因犁架较长，在有石头的田地里耕作不便转弯，适于犁大田平田。坐犁则较轻便，犁时深、浅听便，也容易转弯，同时又因犁面的角度大，泥土翻滚如流，不受阻碍，因此效力比标犁高，一天可多犁3—5分田面。标犁使用历史悠久，老农说前辈早已使用，何时开始使用，现在无法可查。坐犁则是民国十年（1921）左右才有，从南乡传入，系壮族发明。住在山弄里的壮族，田地狭小，多用坐犁，后来平坝上的壮族也使用坐犁。

最先在洛东铸造犁头的是湖南人。据说湖南铸匠因人手缺乏，招聘本地人做帮手（徒弟），本地人才学会制造，以后遂自行开业。三岔吴姓知铸犁头，但不知从何处学来，据说他们以铸造犁头为业，至今已有五代了。但他铸的犁头却不如湖南师傅铸的锐利光滑而耐用，湖南人铸的犁轻而耐用，本地人铸的犁重而不耐用。故犁价前者亦贵一、二角。其原因是：吴姓铸犁，用陶器捣碎成粉末，掺入铁水内，铁较少而陶粉多；湖南人铸犁，则用瓷器捣碎为粉末掺入铁水内，铁水多而瓷粉较少，故吴姓的产品不如湖南人产品质量好。且吴姓的犁头，也较短，其犁嘴尖端成椭圆形，当地农民称之为鸭背犁。而湖南汉人铸造的犁则较尖，称之为鸡嘴犁。

每架犁重约12—13斤，除犁嘴犁面为铁制外，其他部份均为木质，当地木匠都能制造供应。一架犁用一只中等的耕牛拉，一个早晨（3小时）可犁一亩。70—80岁的老人都说，他们幼年时就见老前辈使用标犁，一直沿用至今，其构造形式没有什么改变。坐犁自使用以来，构造也无变化，此外还有古老的踏犁，专用来开垦有石崖的荒地，但数量极少，一村约有三、五把，泵村过去有四把，拉坡也有二、三把。用它来开垦荒地，比锄头好得多，速度也快。因使用踏犁，人可以站立，使用脚踏，可借助体重推之入土。入土后，双手再往下压，泥土即翻开，故较用锄头省力。一部踏犁一天可开生荒地约5分。

**耙** 种类较多，但按其用途，大体可分以下两大类：

（1）使用于稻田的——由木架木齿结构改变为木架铁齿结构，后来再改造为铁架铁齿。铁架铁齿耙重约30斤，但为数不多，因为过重，只能用于旱地，不能用于水田。泵村韦尔金、韦剑犹两位老人说，木架铁齿耙，他们年幼时已见使用，木齿耙在50年前为数已极少，濒于全部被铁齿耙所代替阶段。坡榄社韦文祺（55岁）年幼时已不见木齿耙，韦树明（56岁）14岁时只见同村韦树国使用木齿耙来耙山场里的地，有时也用来耙田，因他家境贫困，

无钱买铁齿耙才使用它，以后各家都用铁齿耙了。大冲村73岁老人韦昭基说，在他幼年时，有用刺竹制成耙齿的耙，成人后才用铁齿耙。70多岁的韦善荣说，在他祖父一代，尚多用刺竹做耙齿，制成后用油煎炸，使它坚硬，但这种耙在他十四五岁后已不见。据韦树明、韦文祺说，45年前，全铁耙就已有入购回使用。又据82岁的韦创犹、韦尔金两位老人说，他们幼时就已见有人使用全铁耙，先是柳城县六塘乡农民使用，后来王格农民也用它来种甘蔗，耙生荒地。大冲以前有两架铁耙，其他村屯少有，多是富有人家才能使用，因为买一架约需稻谷300斤；而且耙地很深，须水牛才能拉曳。

铁齿耙是水田耕作的主要工具。有9齿、10齿、11齿、12齿和16齿几种。16齿的，称之为双耙，须用两头牛拉曳。一般是9齿10齿，全耙长约3.2—3.5尺，大牛用9齿10齿，小牛用8齿以下。铁齿轻重无一定之规格，视牛力及主家需要而定，一条耕齿一般重约4—5两，长约7寸，露出横木以外的入泥部份只有4寸多，上部为四方形，下部圆锥形。横木一般不用铁箍，轻而省钱，但横木一定要坚木。以免破折。

## (2) 用于旱地的

**五齿耙** 中耕除草用。横木长约1.5尺，耙齿形状与一般耙齿同，长约7—9寸（一般耙是6—7寸）露出横木外的一端约6—7寸。玉米苗高1尺左右，即需中耕除草，先用犁浅翻行间的泥，次用五齿耙耙碎，将草耙光。

**三齿耙** 中耙花生地用，齿与一般耙同。

**铲式荡耙** 多木制，横木长1.5尺，耙铲长1.2尺，用一长木板制成，铲口成弧形，重约6斤，用于壅培玉米、红薯，以牛拉曳，从行距中过，使泥壅上根株。但使用不多，因这个乡畜地少，红薯种植也较少。此种工具洛西一带的壮族农民和客家人（汉族）使用的最早，也很普遍，因为那里玉米地较多。

**板式荡耙** 架如铁齿耙式，不用铁齿而改用木板镶在横木之下，板宽约2尺，长1.5尺，用牛拉曳，作推土培畦之用。

**梳耙** 是一种5齿或7齿的手耙，用一尺来长的方木一根，上斲小孔，安上2寸长的铁耙齿，再安上一条6—7尺长的木柄，柄与耙齿成直角。用于梳耙旱地的畦垄，一则可以碎土，二则可使畦土平整。

**人拉梳式荡耙** 以长约1.5尺的方木条，上斲小孔，安上五枚铁制耙齿，齿长与一般铁齿耙同。方木另一面的两端，安上两条短辕木作为系绳之用，横木上方，安直木柄一条，以便掌握。辕木的头上，系上两条各约6尺的长绳，绳的另一端则系上短横杆一条，以便拉曳。此种小耙，专用于培壅作物畦垄，有时也作开沟拨土之用。用时，一人掌握木柄，用力将耙齿压入土中，另一人用双手握住绳端的短横杆，用力拉曳，把土拨上畦垄。

**锄** 种类亦不少，有长、短、大小之分，但样式基本相同。大的重2斤多，中等重1.5斤—2斤，小的重1.3斤左右。大的宽2寸，长7—8寸；中、小的则稍短、窄些。小的多用来开荒，或收获薯芋，大的用来挖掘树根。

这些农具，在八十年前，这里已有工匠打制供应。当时这个乡境内有两户铁匠：一为洛东街的雷姓，从湖南搬来；一为朋友屯的侯姓。有些是到庆远镇做买卖时从那里带回的，或托人代买回来使用。

**刮** 也有两种：一种是方形刮，略带正方形；一种是月形刮。前者又有大小之分：大者重1.5斤，宽5—6寸，长约6寸，多用来壅土培苗，中耕除草，刮草皮灰，或开水沟刮土等；小的重14两（旧制秤1斤为16两），也有重1斤的，高宽各3寸多，多用于中耕除草，除黄

豆、花生地杂草。月形刮（也叫做月亮刮）纵8寸，口宽6—7寸，大的1尺，重2斤多，用于培土除草、剷旧田基和田地尖角，可剷、挖两用，多从宜山县城买回，当地铁匠很少打制，使用的人亦不甚普遍。

**板锹** 形似踏犁，是铁、木结构工具，当地壮族农民用壮话称之为“só”。铁质锹口部份长7寸，宽近5寸，重1.5斤。多用来剷泥、制砖坯，不大不小，易便入模内，可以提高制砖效率。此外，还用它来剷削田基和开行，以及翻耕田头地角，开沟等。此种农具，在距今60年前已普遍使用，家家都购置。之后，有新式铁铲从宜山传来，就逐渐取代了它，以后不复有卖。现泵村韦就白还保存有一把。

**铁铲** 农民称之为“IOK”，重1斤多，宽6寸，长7寸左右（柄的长度不在内），形似形似洋铲，但其边极低，口平不圆，在这里普遍使用已有50多年的历史了。

**镰刀** 有大镰、中镰和锯镰三种。大镰专用来割草，其效率比普通镰刀高二分之一，刀片长1尺，宽约2寸，重8—10两（旧制秤），也有重1斤的。柄长三四尺。用时将柄紧夹于腋下，双手把柄，借助臂力和身体的左右摆动，把草割断。效力虽大，但费力多，青壮年人才能使用，而且只适用于无石或只有小石及平坦的草场，因此，利用率不高。使用不甚普遍。

日常使用的主要是小型镰刀，刀片长5—6寸，宽1.5寸，重6两。割禾割草都用。但按其镶钢方式的不同，又分“边钢镰”和“破钢镰”两种。前者刀口含钢部在一边，左手使用的则镶于左边，右手使用则镶于右边。这种镰刀刀刃较薄，对割较大较硬的柴草时易缺口。破钢镰含钢部在刃口中间，因而口部较厚，砍柴不易钝缺。这些镰具，本地铁匠均能打制供应。

**锯镰** 是一种专用于割稻麦用的小镰。刀片成新月形，宽不盈寸，上镌锯齿。韦尔善老人说，他幼时已见有人使用，但不多，一家约有一两把，部份户还没有。多由南乡（屏南）铁匠打制，每年粳米将要收获时便挑到洛东三岔街上出售。而洛东本地工匠从未打制。清光绪以后，使用的人就逐渐少。至解放前夕，使用锯镰的人几乎是屈指可数了。其原因，据不少农民说，锯镰利用率不高，只能割稻谷，不能割草砍柴，只有富有人家，才备有割禾割草两套镰刀；贫家田少，买用普通镰刀既可收稻，又可割草砍柴，故很少买锯镰。何况，过去割老禾（晚稻）时，先割稻秆的一截，即把稻穗割下后，再把下半截砍掉，以便收割之后，放火焚烧作为肥料种麦。如用锯镰只能割不能砍，割时必须一手抓禾秆，一手持镰，而用镰刀，只用一手便能顺利地把禾秆的下半截砍倒。

**柴刀** 也有几种，一种是有钩的（钩长1—1.5寸），一种是没有钩的。主要用于砍柴，破柴。没有钩的柴刀，利用率较大些，它可砍柴，又可砍切猪菜，同时也便于修削竹木，修造竹木用具。刀片长5—6寸，宽2寸多，厚2—3分，一般重1斤。此外，又有一种重1.5斤的大柴刀，无钩，多用砍大树，烧炭时使用此种工具来砍伐树木。

### 3. 生产技术

#### （1）耕作方法

这里除山坡畚地实行休耕外，其余平地 and 稻田都是年年耕种，并不间歇。但有些作物也实行轮休种植，年年变换。但这种种植方法并不普遍。

作物的种植方法有秧植，如稻谷、菸草、蔬菜等都如此。有直播（如玉米、麦类、豆类

都如此),点播,坑种和撒播等。几种作物间种、套种的现象很少。如黄豆,在本地区一般不习惯在玉米行间套种,而是单独种植的。冬季作物的种植亦很普遍,主要是大麦小麦和油菜等。

各种农作物的种植方法大致如下:

稻谷——每年二月(农历、下同)中、下旬便开始整理秧田、春社后20天撒秧。老谷(中糙)则在谷雨前后播种,早秧在春社下种。

农民在春社时,就把肥料运往田间。犁耙田面和撒秧,大都集中在三月或四月。芒种开始插田,到五月中、下旬,全部稻田的插秧工作即告结束。

这里的农民对水稻的护理工序是这样的:在冬季作物(大、小麦或油菜)收割后,(时间在四月初),便灌水沤田,开始犁田耙田。未经翻犁的田,就在春耕时翻犁一次,翻过以后灌水再耙。犁耙既毕,施放牛栏粪,然后灌水浸沤。一担谷田面(四分之一亩)用肥二担,有的一亩田施用量高至十担,施用时以烂泥敷盖,以免肥水流失。肥料和田泥沤制大约半月后,即在插秧前一天,再挑石灰去施放,每亩施灰量多者三担,少的仅一担,此后再耙一次,即可插秧。耕作过程一般的是一犁二耙,每耙一次,纵横约四至六个来回。人力牛力较足者,也有耙三次的。冬种的田,因已经翻犁一次,所以春耕时,直接灌水耙田即可,不必再犁。农民认为,这样的田,如果再犁一遍,禾苗反而长得不好。

稻田犁耙完毕后,就插秧。其规格是:株行距大都是 $8 \times 8.8 \times 10$ (寸)。插完后,约过半月,耘田薅草一次,并追施肥料(主要是石灰和草木灰,有的则施放草灰和猪粪混合肥料约二担),一般的一亩田施石灰一担,或草木灰一担,有的或施放土皮灰。施肥的方法都是撒施。如禾苗长势较差,则将草木灰或土皮灰点蔸。少数富裕人家还用石膏、食盐、茶油麸等作厩肥。第一次薅田施肥过后,再过半月,又进行第二次中耕。中耕时用脚拨泥,用手拔草,一人一天可耘田二亩。以后,除按时灌水外,便无其他工作可做,即等待收获了。

总的说来,稻谷种植的工序不甚繁多,耕作技术却不算落后。一个普通的劳动力,只需十个工左右,便可完成一亩稻田从播种到收获的全部工作量。今以一亩田为例,各种工序的需工量如下:

耙三次——每次五、六转,需三个早晨,每晨三小时,共需二个工。

运肥——普通距离,一个工可完成(以挑肥八担计算)。

插秧——连拔秧、运秧、插秧,一共二个工。

割田基草——连看水共二个工。

耘田二次,连挑石灰二百斤在内,共二个工。

收割,打谷、运谷,共二个工。

全部合计共需十一工。

水稻的收获量较高。据老人说,在六、七十年前,这里的稻田土地肥力大,所以水稻(老禾)长得很好,禾秆高如人,粗如筷;但到后来,土地肥力日低,禾苗长势渐差。解放前,中等田一亩可产350斤—400斤,好的可收600—700斤,〔以上均系老秤(100斤=120斤)〕。下面将本乡汉族农民和壮族农民的耕作情况列表作一比较:

汉族农民耕作情况	壮族农民耕作情况
1.犁田从中间犁起	1.犁田从四边犁起
2.多数是三犁三耙	2.一般是一犁二耙
3.年年普遍地刈敷田基	3.很少刈补田基
4.犁田深5—6寸	4.犁田深只3—4寸
5.用人粪尿肥田	5.人粪尿只用于种蔬菜，不用于肥田地

上表说明，本地壮族农民种植水稻的技术虽然已相当先进，但比起附近大曹、塘冲、大成等村的汉族农民，仍然存在着一一定的差距。

解放前，壮族农民已有种二糙稻谷和种植二造玉米的习惯，但还不太普遍到解放后才普遍推广。在这里，特别需要提及的是二苗的种植问题。

二苗究竟何时开始种植，老农的说法各不相同。泵村八十二岁老人韦尔金，韦剑犹两人说，他们年幼时，就见本村和大冲、大曹、大成、同上、花流等村的农民种植二苗了，但数量不多，一家只种数亩，且多是贫苦人家种植的，用以解决荒月粮食问题；富足人家仍种老禾，不种二苗，或很少种二苗。其原因大概是：（一）地广人稀，所收粮食已足以维持生活，无须推广二苗；（二）阴历六月中，收割作物已够忙碌，如果再种植二苗，那就更忙了。田多人手缺，所以多不种二苗而种麦。这样，农活就较缓和一些。况且麦的产量也并不很低（每亩可产200—250斤）。本地二苗的种植，据说最先开始于大曹村汉人，该村的种植面积亦较广。当时头造多种九工早（粘米），二造则种矮仔粘。大曹的二造原种系由柳江县洛满流山墟传入。九工早以前在洛满（五都）种植，而该县的一都、二都种植更多。这些地方都是壮汉杂居之所，两者人口各占一半。又据大冲七十三岁的贫农韦善荣说，本村在民国十九年左右才有种植二苗的，到民国二十九年左右才普遍，比前说迟了几十年。又据大冲村六十多岁的韦定仁说，本村种植二苗，在二十多年前才较普遍，在此以前，村人虽有种植，但为数不多。同村七十二岁的农民韦昭兰说，大冲村约在民国七、八年光景，始有种植二苗，但各户只种几亩，主要仍以种植老谷为主。据他说，本地各村，最先种植二苗的是大曹村，其来源系传自柳城的六塘。又据七十一岁的中农韦尔本说，在他年纪尚幼时，就听到流山墟开始种植二苗，后来大曹村的汉人引种过来试种，附近才有二苗。因大曹与流山墟的自然条件相差不多，两处都是泡水田，水利条件好，所以推广起来方便。喇坡、坡榄等地因水利条件不好，所以种二苗的时间稍晚，但至今也有四十多年的历史了。按流山墟与洛东相距不过八十华里。当洛东还未种植二苗时，于青黄不接之标，常有流山墟的农民挑新谷（头苗）来洛东出售。因为这时米价都较平时昂贵，所以大曹的汉人亦仿种二苗以牟利。二苗就这样先在大曹开始种植，并逐渐推广到其他村屯的。以上各说，在时间上虽不一致，但二苗在本地的种植，已经有30—70年的历史，那是可以肯定的。

头苗——九工早，每年清明时撒秧，经28—32天，到立夏前后，便开始插田。约经90天的培育，到了六月下旬，即可收割。一般上等田1,000斤田面（相当2.5亩），可收谷500—600斤，中等田可收400—500斤。

二苗——矮仔粘，都在每年农历五月初撒秧，经40天的育秧后，至六月下旬即可插秧。到九月末收割。普通1,000斤田面，上等田可收获300—400斤，中等田亦可收200—300斤。

玉米是本地普遍种植的作物之一。它的种植方法较为简单，耕地一般是一犁一耙，开行后即可下种。六月玉米多在惊蛰节下种，秋玉米多在小暑下种。种植的方法都是点播，每坑下种籽2—3粒，每亩需种籽1斤又12两（旧制），株距为1尺至1.2尺，行距为1尺至1.3尺。在种植时即施放基肥。前人种植，每亩都施放草灰与猪粪灰之混合肥二担，以后不再施肥。至解放前的三、四十年，除下种时施放基肥外，于除草时每亩再施牛粪肥三担左右。在玉米苗长高达五寸光景，中耕间苗一次，进行除草，施加肥料。至苗长高二尺后，再犁地培土一次。培土用荡耙，其工序是：先用犁将行间的泥翻松，再用五齿耙耙碎，除去杂草，然后再用木制荡耙耙理行间，把土培成畦垄，壅在玉米苗根部。一亩玉米地需工量如下：

一犁一耙并开行，需时一早工（三小时）；

运肥连点种，共需二早工（六小时）；

中耕除草追肥培土二次，共需二个工；

收获，二个工。

总计每亩玉米地自播种至收获共需五个工。但积肥所需之工，尚未计在其内。

据老人说，以前种玉米时，只施基肥一次，每亩可收生玉米（棒）400斤，到解放前的十来年间，较好的一亩都可收生玉米粒300斤左右。

小麦都种植在田里，也有少数种在畚地里。种植方法是：收稻以后，将禾稿留在田里，把它撒开，（中下等田都如此），然后放火焚烧，翻犁田土，撒下种子后，再把田土耙平打碎即可，以后不再施肥，也不必除草，待成熟后收割。除此之外，也有开行点播的，方法是：翻耕泥土并开行后，以草木灰拌麦种点播于行内。这样种的好处是：疏密度合适，麦苗长得均匀。但需要种子较多，每百斤田面，约需种子二斤，而撒播只需一斤半已足，唯下等田亦需二斤（折合每亩6—8斤）。每亩可收获小麦140—200斤。

油菜、荞麦的种植方法与小麦同。它们的产量是：小油菜，一千斤田面可收得120—140斤，最好的可得到300斤；荞麦一筒种子（约六两）可收获30—50斤。

本地种一亩小麦、大麦所需工日大致如下：

犁田一次，连烧禾秆在内，需半个工；

撒播种子，约需三分之一工；

耙田碎土盖种，需三分之一工；

收割，一个半工。

总计全部需工约三个工。

黄豆多种在旱地上。它的种植技术是相当先进的，方法是：土地一犁一耙后，再用长柄小铁锹掘土成深约二寸的小坑，株行距为6×8寸，每坑点种子三、四粒，然后再放一把草木灰或猪粪灰于种子上，不再盖土。每五斤种子，须施草木灰或猪粪灰100斤。一亩地需种15斤，共需肥料300斤，以后再中耕除草一次就可等待收割。产量颇高，一亩可得黄豆80—100斤，好的可收200—300斤（解放初期大冲一个互助组每亩曾收500斤），

种植黄豆每亩需工：

一犁一耙，需一个工；

点种及施肥，共需一个工；

中耕除草，需一个工；

收割和脱粒共二个工。

总计每亩五个工已足，快的只要四个半工。